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丛书

西域历史与文献论丛

(第二辑)

施新荣 徐军华 主编



學苑出版社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丛书

西域历史与文献论丛

(第二辑)

施新荣 徐军华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域历史与文献论丛. 第二辑 / 施新荣, 徐军华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077-5006-5

I. ①西…II. ①施… ②徐…III. ①西域-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7577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67601101 (销售部)、67603091 (总编室)

印刷厂: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开本

印 张: 18.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元朝前四汗时期西域汉人的来源	贾丛江 (1)
明代西北地缘政治之演变	施新荣 (10)
苏非派圣者传《心灵之光》初探	白海提 (23)
兰州碑刻所见清代新疆史事	王鹏辉 (36)
清代新疆常平仓的发展与管理	何 荣 (50)
清末吐鲁番养济院研究	赵 毅 (62)
《抄本奏议》与清末新疆新政之筹备	王启明 (73)
民国年间新疆的工会探析	贾秀慧 (81)
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刘学堂 李文瑛 (101)
从“异族同俗”的演变看北庭的意义	盖金伟 (126)
岑参诗中西域地名语音流变例释	夏国强 (132)
从吐鲁番到敦煌 —— “Turpan” (吐鲁番) 一名语源、语义考	
.....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	(137)
古今维吾尔语马具术语及其语言透视	艾克拜尔·吐尼亚孜 (149)
《福乐智慧》中诚信观对维吾尔族社会交往的启示	艾扎木·艾拜都拉 (160)
吐鲁番敦煌出土古代维吾尔语谚语解析	巴克力·阿卜杜热西提 (167)

“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西域撰述”探微	马晓娟	(174)
晋唐时期吐鲁番的史学	王旭送	(181)
王树楠与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	朱玉麒	(191)
明代笔记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及价值论略	姚晓菲	(223)
《三州辑略》吐鲁番史料的来源	徐玉娟	(235)
略论首都图书馆所藏新疆乡土志抄稿本之价值	高 健	(242)
《孚化志略》编纂者考辨——兼论其成书时间与版本	任 龙 高 健	(250)
《天山赋》著者考辨	史国强	(258)
萧雄西域事迹考	吴华峰	(263)
乾隆帝与《塞宴四事》	周 轩	(272)
清代刻书家龙万育生平考述	颜世明 高 健	(281)

元朝前四汗时期西域汉人的来源

贾丛江

元朝前四汗时期^①（1206—1259），数位出身内地的人，曾经前往西域，归来后留有行程记。这些文献成为人们了解 13 世纪前期西域各地情况的珍贵史料。多部行程记中均记录了当时西域汉人的情况，使人们对蒙元时期西域居民的构成有了更多了解。这些西域汉人的来源，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蒙元时期，蒙古军队屡次西征，扫除了隔绝亚洲内陆交通的壁垒，使臣和旅行者往来于丝路。其中有三批人的行程记中留下了西域汉人的记录。现将与本文讨论主题有关的史料摘录于下，以便下文探讨。

《长春真人西游记》^②，由李志常撰写，记录了在元太祖十五年至十九年（1220—1224）间，丘处机奉诏前往西域谒见成吉思汗的往返行程。文中多处提到西域的汉人。

史料一：

西即斡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

^① 关于元朝的起始年代，学界有 1206 年、1260 年、1271 年、1279 年诸说，以 1206 年为宜。参见陈得芝《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及疆域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② 本文所用《长春真人西游记》刊本有三，一是《王国维遗书》中的录文，第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二是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中的录文，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68—230 页；三是陈佳荣、钱江、张广达合编《历代中外行记》中的录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第 527—536 页。以下所引该行记，不再注明出处。

冠与中国特异。……时，回纥王部族供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载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

史料二：

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眉头目来迎。南望阴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诗赠书生李伯祥。生，相人。

史料三：

至阿里马城，……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

史料四：

（邪米思干）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

史料五：

至阿里马城东园。二太子之大匠张公固请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且预接数日，伏愿仙慈渡河，俾坛众得以请教，幸甚。”

《北使记》^①，由吾古孙仲端口述，刘祁或刘郁笔录成文（录者何人，存有争议），记载了元太祖十五年至十六年（1220—1221）间，金朝使者吾古孙仲端前往西域向成吉思汗乞和的行程。《北使记》也涉及西域汉人的线索。

^① 本文所用《北使记》刊本有三，一是《王国维遗书》中的录文，第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二是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中的录文，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1—236页；三是陈佳荣、钱江、张广达合编《历代中外行记》中的录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537—539页。以下所引该行记，不再注明出处。

史料六：

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纥中，……政荒，为回纥所灭。今其（西辽）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惟和沙州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

《西使记》^①记录了元宪宗九年至中统元年（1259—1260）间，元朝使者常德前往波斯西觐皇弟旭烈兀的往返行程，系刘郁笔录。《西使记》有多处记录了西域汉人的情况。

史料七：

数日过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已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有二麦黍谷。河西注渚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

史料八：

有关曰铁木儿忒察，守关者皆汉民。

史料九：

至阿里麻里城，……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

史料十：

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

前引十条史料，分别出自记录丘处机、吾古孙仲端、常德三批西行者的行程记，西行的时间，上迄元太祖十五年（1220），下至中统元年（1260），正好是学界所说的元朝前四汗时期。由于是行者见闻，故其真实性不容置疑。而这些史料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这些汉人迁到西域的方式，与汉唐时期西域的汉人明显不同。他们不是随中原王朝在西域置守、屯戍而迁到西域的，而是随着游牧

^① 本文所用《西使记》刊本有三，一是《王国维遗书》中的录文，第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二是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中的录文，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7—250页；三是陈佳荣、钱江、张广达合编《历代中外行记》中的录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559—563页。以下所引该行记，不再注明出处。

民族迁徙征战而被裹胁迁来的。当然，这是人们对元朝前四汗时期西域汉人的来源的初步判断。然而，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是发现这些西域汉人的来源问题，比那个“初步判断”更为复杂，需要做进一步探究。

二

这些西域汉人的主体，是在元朝前四汗时期（1206—1259）迁到西域的。他们的迁徙，是和这一时期蒙古军队的多次西征、蒙古贵族领主受封于西域各地等诸多事件有直接关系。

元朝前四汗时期，蒙古军队在广义上的西域地区，进行了多次西征：（1）成吉思汗西征：元太祖十四（1219）年至二十年（1225），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花刺子模国，占领广大中亚地区。（2）绰儿马罕西征：元太宗元年（1229）至三年（1231），窝阔台汗命绰儿马罕为统帅，征讨在波斯地区再度兴起的花刺子模国王子扎兰丁。（3）长子西征：元太宗七年（1235）至元乃马真后三年（1244），窝阔台汗命拔都统率各支长子，自里海向西向北发动进攻，征服了钦察草原和斡罗斯地区。（4）旭烈兀西征：元宪宗三年（1253）至元中统元年（1260），蒙哥汗命皇弟旭烈兀，自里海向西南方向进军，征服波斯全境。蒙古军队的每一次西征，除蒙古人以外，还有大量已征服地区的居民随军从征，包括大量汉人；蒙古征服西域以后，成吉思汗将三个儿子（幼子拖雷除外）分封于广义上的西域地区，三位皇子以及隶属于他们的蒙古贵族，都有大量的包括汉人在内的驱口和投下户，其中很多人随其领主迁到了西域。

这些汉人大致包括两部分人，一是从征的汉人军队；一是被征发和裹胁而来的汉人工匠和蒙古贵族所属的汉人驱口和投下户。据《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记载，华州郑县（陕西华县）人郭宝玉，早年作为金将降归木华黎，后率所部从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收马里四城”；二十多年后，其孙郭侃又“从宗王旭烈兀西征”。郭氏爷孙只是西征汉军的代表。前引史料八所录的“有关曰铁木儿忒察，守关者皆汉民”，应当也是前四汗时期从军西征的汉人军队。这一时期来到西域的汉人工匠也不在少数。史料四中所记邪米思干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中就有“汉人工匠杂处”，这段史料前半部分提及该城当地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河西人”是元代对西夏国人的专称，而西夏人除了在元代曾大量迁至西域外，此前并无迁居西域的情况，因此，这条史料

反映的西域汉人工匠，肯定是随蒙古军队西来的。史料五提到，丘处机在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曾遇到“二太子之大匠张公”，此人是察合台帐下的工匠头领，掌管“三坛四百余人”，从这四百余人“晨参暮礼”并力邀丘处机前往以使“俾坛众得以请教”一事来看，这些人无疑都是汉人工匠，是此次蒙古军队从金朝或西夏境内劫掠的驱口。从张公“二太子之大匠”的身份判断，这些人是隶属于察合台的驱口。前引十条史料中，史料二所提到的丘处机在轮台（唐轮台）赋诗相赠的“书生李伯祥”，也应是随成吉思汗西征而来到西域的汉人，其证据在文中已有暗示：“生，相人。”“生”即指书生李伯祥，“相人”即相州人的简称，这是汉地的通用惯例。此人知道自己的籍贯，说明他只能是随成吉思汗西征大军前来西域的。因为在此之前所出现过的最后一次大量汉人西迁的历史，要上溯到近百年前的耶律大石西迁。如果李伯祥是随大石西迁的汉人的后裔，则他不可能还留有“相人”这种籍贯观念。史料十所提到的常德在13世纪50年代看到的赤木儿城（新疆霍城西）的大量汉人，也是元朝前四汗时期迁来当地的。其证据同上，《西使记》明确记载了他们的籍贯：“并、汾人。”

三

元朝前四汗时期（1206—1259）见诸汉文史籍的西域汉人，有一部分和西辽境内的汉人有关，他们是原来随耶律大石西迁中亚的汉人的后裔。

众所周知，12世纪早期，在女真人的打击下，辽朝迅速衰亡。辽保大四年（1124），在辽朝行将灭亡之际，辽朝皇族耶律大石自立为王，在辽朝西北路招讨司治所——镇州可敦城（喀拉喀河下游青托罗盖古城）^①，召集七个军州和十八部大会，从各州、各部征集了一万多兵马。宋绍兴元年（1131），耶律大石率部西迁，来到叶密立河（额敏河）流域。据伊本·阿西尔记载，当地为喀喇汗王朝守边的“一万六千帐”游牧人投靠了耶律大石，使他的军队“增加一倍”^②。这一万六千帐（户）游牧人，主要是操蒙古语族方言的契丹近族人和一些操突厥语族方言的游牧部落。志费尼也记载，到达叶密立后的耶律大石部众，增加到四万户^③。这两段史料，说的是一件事。宋绍兴二年（1132），耶律大石即皇帝位，以

① 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5—56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莫斯科，1973年，第65页。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7页。

辽朝正统自居，沿用“大辽”和“大契丹”的国号，“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史称西辽。此后，西辽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东部和西部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国、葛逻禄部、康里部、乃蛮部，统一了葱岭东西，划七河流域为直辖地，定都虎思斡耳朵（即巴拉沙衮，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

关于耶律大石部众的人数，伊本·阿西尔和志费尼提供了不同的两组数字。这两组数字虽有差异，但是基本上反映了实情。按伊本·阿西尔的数字，新加入的一万六千帐（户），使大石的军队增加一倍，则原先西迁的军队也大致是一万六千帐左右，总数则上升至三万二千帐左右。按志费尼的数字，其部众增加到四万户，这是一万六千帐游牧人加入以后的数量，则原来西迁的部众应是二万四千帐左右，这就比按前一组数字所计算的数量多出了八千帐。然而，伊本·阿西尔提供的数字是指按兵员（“军队”）计算的帐数（户数），按照游牧人一般是一帐（户）一兵的原则，三万二千帐实为三万二千名士兵。考虑到西迁的契丹部众中还包括一些非战斗人员，如宫帐属民、南北面官署人员及其属民等，如果除去这些人，其兵员帐户也与一万六千帐相去不远。因此，我们可以将最初跟随耶律大石西迁的部众帐数，界定在一万六千帐至二万四千帐之间。这些人以契丹人为主，也包括七个军州的大批汉人及其他部族的人。

对于大批汉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西域之事，中外史籍中均有明证。据穆斯林史料，在西辽康国八年（1141）塞尔柱王朝和西辽之间爆发的卡特万大战中，西辽的军队“拥有突厥军、汉军、契丹军等”^①。“汉军”和“契丹军”、“突厥军”并列，并排在“契丹军”之前，说明西辽境内汉人的人数是很多的。而汉文史料也反映了相同情况。耶律楚材提到，李世昌曾为西辽郡王，做过“中书”，其祖先曾经是耶律大石的宰相^②。宋人张浚在《奏虏中事宜状》中称：“臣近据曲端申，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国书赴朝廷，为夏人截留。有元送文字汉儿走透过泾源，供析到上件事理……”^③这个“汉儿”即是耶律大石的使臣。

有迹象显示，在12世纪早期跟随耶律大石西迁的汉人中间，有些人一直将本民族属性保持到元朝前四汗时期。上文提到的李世昌就是一个例证。据前引史料六，元太祖十五年（1220），当金朝使者吾古孙仲端进入“益离城”（新疆伊犁

^①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十卷，第57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一辑，莫斯科，1973年，第67页。

^② 伊本·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十卷，第57页。转引自《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一辑，莫斯科，1973年，第67页。

^③ 《永乐大典》卷10876“张魏公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466页上栏。

地区境内)以西的原西辽直辖地(七河流域)之后,看到“今其(西辽)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虽然此时距西辽灭亡(1211)仅仅10年,但是,七河地区的社会景观已是一片破败。可以想见,在经历过西辽王朝、花剌子模国、乃蛮王子屈出律和蒙古军队的多次战争洗劫之后,七河地区的社会和人口遭到严重损失,尤其是国破之后的契丹人和汉人,处境更加悲惨,不但有大量人口损失于战火,而且存活下来的人也只能改换衣装,风俗渐同于当地穆斯林土著。但是,如果细究吾古孙仲端的描述,可以发现,虽然西辽“国人无几”,但是仍然还有存留;虽然“衣服悉回纥也”,但是吾古孙仲端仍然还能识别其身份。而同条史料的后半部分“惟和沙州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也可视作对原来西辽的汉人留存于13世纪前期的一种注脚。

四

元朝前四汗时期(1206—1259)时期西域汉人的第三个来源,是源自唐代西域汉人的后裔。

史料一中提到的丘处机在鳌思马大城(别失八里,新疆吉木萨尔)的所见所闻,明确显示当地不但有汉人,而且这些汉人还是唐代庭州汉人的后裔。提到当地“回纥王”在宴请丘处机一行时,“列侏儒伎乐”,这些人的身份,李志常有明确提示:“皆中州人。”这里的“中州”是内地或中原的代称,与同书中指代籍贯的“相人”、“并、汾人”的意思和用法都明显有别。辽宋金元时期,用“中州”指代过去传统的“汉地”,这是一种常见的用法,这一时期弃用“汉地”而改用“中州”,和当时汉、女真人、契丹人杂居于传统的“汉地”一事有关。其实,史料一的后半部分也对这些人的唐代汉人后裔身份有所提示:其一,文中提及“侍坐者有僧、道、儒”,儒生是汉人身份,大致不会有错;而道教是汉人的宗教,鳌思马城道士的衣冠与内地“特异”,这正显示出这些道士不是在金朝到元朝时期从内地迁到西域的,否则,当地道士的衣冠样式应当与丘处机等人的相同或相近。其衣冠之所以给道士李志常造成“特异”的强烈印象,要么是反映了唐朝和金朝道士服饰的发展变化,要么是反映了鳌思马城的道士,在长期的发展中受到当地居民服饰的影响。不论是何种情况,都证明这些道士不是在金朝至元朝前四汗时期迁来的,而是唐代庭州汉人的后裔。其二,从丘处机参加宴请的情景,以及他和“侍坐者”的对话中,也反映出应答者的汉人身份和他们是唐代

汉人后裔的出身。为探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比照一下《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所记录的鳖思马城宴会和昌八刺城宴会的不同情景——游记中这两段文字前后相接。昌八刺城（新疆昌吉）的宴会情景是：“其王……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泊其夫人劝葡萄酒，且献西瓜。……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曰：‘剃度受戒，礼佛为师。’”而史料一所录鳖思马城宴会的情景是：“回纥王部族供蒲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两处食物相似（葡萄酒、瓜果），程序相近（迎、宴、侍坐者），但有两点区别：昌八刺城为“回纥僧”，鳖思马城为“僧、道、儒”——没有外加族属身份“回纥”，显示其汉人的身份；昌八刺城，丘处机与侍坐者交谈需要“使译者问看何经典”，鳖思马城，丘处机直接向侍坐的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说明这些僧、道、儒均是汉人，无需译者。而侍坐者的答话，也反映出他们和唐朝的深厚关系：“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载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由答话可知，交谈内容无一不涉及唐朝。也许他们所说的杨大都护的“德政”所导致的“惠及后人，于今赖之”之意，正是指他们这些唐代汉人后裔，在四百多年以后（8世纪末唐已失庭州），还能在当地保持民族属性、平安生活的现实吧。

唐代西域汉人后裔，在历时四百多年以后，仍能保持民族属性，这件事看似不可思议，其实也有历史脉络可寻。众所周知，唐代庭州（新疆吉木萨尔）、西州（新疆吐鲁番）、伊州（新疆哈密），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不同于西域其他地区的羁縻府州制。回鹘西迁后，三地的汉人曾长期保持着民族属性。《突厥语大词典》的一段记载，说明了这个问题：“回鹘人还有和秦人文字相似的另一种文字，官方文牒都使用这种文字。除了非穆斯林的回鹘人和秦人外，其他人是不识认这种文字的。我上面谈的是城镇居民的情况。”^①这种“和秦人文字相似的文字”是何种文字呢？笔者以前曾经做过探讨，那就是汉文^②。《突厥语大词典》中的“秦人”是指辽朝人，汉人（北宋）被称为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②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阅笔者所撰《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薛宗正主编）第五章“五代辽宋金时期”，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4—395页。

“马秦”，其书对此载有专文：“‘回鹘’、‘党项’、‘契丹’等部落，契丹即秦，最后为‘桃花石’，亦即马秦。”^①既然这种文字和秦人（辽朝）的文字相似，那么，辽朝契丹文字又是什么样的呢？契丹文字有大字和小字两种。汉字是契丹大字之源；是仿汉字改制的，“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②，保持着方块字形。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取法回鹘文，但是，其“原字”字形，是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改造的，并参照汉字的反切拼音方法，以原字作为读写单位拼成字或词。据学者研究，有的小字和汉字完全相同，有的是改造汉字而成^③。从出土的契丹小字来看，其字形和汉字是一个系统。再者，汉文本来就是辽朝最主要的官方文字，通行范围远过于契丹大、小字，辽朝的诏令、公文主要是用汉字来发布，留存于世的契丹人文集，几乎全是用汉文写就的。所以，这种“和秦人文字相似”、秦人也认识的文字，只可能是汉字。这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直到《突厥语大词典》成书的11世纪70年代，东部天山地区还有大批汉人使用着汉语文、保持着本民族的属性。据《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载，居住在城镇的回鹘人认识汉语文，高昌回鹘王国政府曾经以汉文为“官方文牒”使用的文字，即官方文字。这说明，西迁后的回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实际上曾经有过汉语化的过程。这种汉语文的留存现象，实质上说明了一个居民属性的问题，即在唐朝失去西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都存在着大量保持着民族属性的汉人后裔。这一事实，为人们理解13世纪前期西域存在着保留民族属性的唐代汉人后裔的真实历史，提供了一个支点。

综上所述，在元朝前四汗时期（1206—1259）汉文史料屡次出现西域汉人的身影，他们有三个来源：一、其主体是受蒙古军队多次西征和蒙古诸王贵族受封于西域等事件的影响，被征发而来的；二、一部分汉人是12世纪30年代跟随耶律大石西迁汉人的后裔；三、个别地区存在唐代西域汉人后裔一直保持着本民族属性的情况。

（本文原载《西蒙古论坛》2011年第3期，第16—21页）

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②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

③ 参见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页。

明代西北地缘政治之演变

施新荣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活动于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如先秦秦汉时的北狄、匈奴,魏晋隋唐时的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宋辽金元时的契丹、蒙古等皆兴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对中原王朝无不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取而代之。欧亚大陆西端也是如此,游牧部族不断兴起后进入农耕区域,对欧洲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中外学术界探讨已久的重大历史与理论问题。汉代司马迁说: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①;后晋的刘昫在其所修的《旧唐书》中也说:回纥“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②。关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关系,20多年前,有学者综合中外各家观点,将之归结为虏性狼狠、气候变化、人口膨胀、贸易受阻、掠夺有利、扩大统治、文化不同等七种解释。^③此后,国内外一些学者借助人类学的理论进行研究,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如美国学者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④、狄宇宙(Nicola Di Cosmo)^⑤、台湾学者王明珂^⑥等都出版了值得重视、关注的专著。

就明朝时期而言,西北地缘政治主要受到明朝与北方及西北地区的蒙古游

①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2955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195页。

③ 王小甫《古代游牧部族入侵农耕地区问题的研究》,《史学情报》1988年第3期,此据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9—292页。

④ Barfield, T.,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 Blackwell, 1989.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⑤ Di Cosmo, N.,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2002. [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他的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⑥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牧部落政权相互关系变化的影响。本文拟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和平交往与武力冲突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有明一代西北地区地缘政治的地位与特点,按照明代历史发展的特点为主线,就西北地区各政治力量变化的特点,分前、中、后三个时期来论述明代西北地缘政治的演变。

一、明前期西北地缘政治与陕西行都司卫所体系的建立

《元史》卷五八《地理一》曰:“汉梗于北狄……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①有明一代所遇到的外部政治压力也大体如此,主要是北部及西北部的蒙古。虽然明代之西北失去了昔日汉唐时的重要地位,不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军事地位却丝毫未曾减弱。

如所周知,元朝将吐蕃地区正式纳入中国中央王朝的国家版图和直接治理的体系之内,在吐蕃地区设立隶属于宣政院的三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陈得芝先生认为,宣政院统辖吐蕃三道的职能就相当于一个行省,《汉藏史籍》说吐蕃三道“算作一个行省”,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②。加之,元代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与青藏高原上的各游牧部族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结成了特殊的蒙藏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形成联合之势,不仅将切断明朝西北通往西域之交通,而且也必将危及全陕的安全及中原的稳定,对明朝在西北的统治构成严重的挑战。

史称“陕西地方广阔,内连八郡,外控三边,为根本机要重地”^③,朱元璋认为“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④。对于明初西北的元朝守将,明人高岱分析说:“山西、陕西之虏,李思齐、张思道、扩廓帖木儿三人耳,如贺宗哲、孔兴等,不足言也。李、张二虏虽拥众,然非我诸将敌,惟扩廓最强犷。”^⑤因此,当洪武二年(1369),明军“定陕西”^⑥后,朱元璋“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建重镇于甘肃,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⑦。废州立县,编民为兵,

①《元史》卷五八《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345页。

②陈得芝《序言》,见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③〔明〕杨一清《为考选军政官员事》,〔明〕杨一清著,唐景坤、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8页。

④《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278页。

⑤〔明〕高岱《鸿猷录》卷五《堪定关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⑥《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8539页。

⑦《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二》,第8549页。

建立军事卫所，在河陇、河西地区陆续设置了巩昌、平凉、兰州、庆阳、河州（洪武十年分河州卫为左、右二卫）、甘肃、庄浪等卫。从洪武六年（1373）起，明朝又先后设立了西宁、凉州、岷州等卫。洪武七年（1374）七月，明朝在河州设立西安行都卫，辖河州、朵甘卫及乌斯藏卫。次年，西安行都卫更名为陕西行都司。洪武九年（1377年）陕西行都司被废，以上诸卫所全部归陕西都司管辖。由于“甘肃去陕西都司绝远”^①，陕西都司的治所在西安，其辖区东西跨度过大，不利于对河湟，特别是对河西的管理。洪武十一年（1378）“西番屡寇边”^②，明太祖“命西平侯沐英为征西将军，率都督佥事蓝玉、王弼将京卫及河南、陕西、山西马步官军征之”^③。次年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儿、癭噶子、乌都儿及阿卜商等叛，据纳邻七站之地”^④。据研究，元代的纳怜道有二十四站，其路线大致出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溯黄河而西，穿过甘肃行省北部，直达西北边境，这条驿道的大多数站都在甘肃行省境内^⑤。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乱所占据的“纳邻七站”，疑为“纳怜道”位于故元甘肃省境内的部分驿站，这严重影响到河西的安危。明朝于这年的正月甲午，“复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庄浪”^⑥，以加强对河西的控制。九月，“征西将军沐英等兵击西番三副使之众，大败之，擒三副使癭噶子等”^⑦，“西番以平”^⑧。史称“自是，群番震慑，不敢为寇”^⑨。在平定西番的过程中，明太祖还“命曹国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临洮、巩昌、梅川等处整治城池，督理军务、边境事宜”^⑩，并下令在“西控番夷，东蔽湟陇，自汉唐以来备边之要地”的洮州置卫^⑪。洪武十三年（1380），北元“国公

①《明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六，正统三年九月庚戌条，第903页。

②《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一月庚午条，第1960页。

③《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一月庚午条，第1960页。

④《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二年正月甲申条，第1972页。

⑤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见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⑥《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二年正月甲午条，第1973—1974页。按，有研究者认为，陕西行都司仅存在到当年的七月就被废，洪武二十六年重置。见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82页；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2—403页。

⑦《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九月己亥条，第2014页。

⑧《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一八，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丁卯条“沐英传”，第3206页。

⑨《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二》，第8541页。

⑩《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二二，洪武十二年二月戊戌朔条，第1974页。

⑪《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二三，洪武十二年三月丁亥条，1986页。